

作家学者谈及创意写作——

可以教写作,不能教创造

□本报记者 行超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的罗常培就曾经说过:“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对于那些怀揣着作家梦进入中文系课堂的文学青年来说,这无疑会让他们倍感失望。这一说法却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被许多中文系教授反复提及,几乎成了文学界的共识。很多人因此以为,写作是某种后天无法习得的天赋,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玄妙之味。

然而在美国,写作却远远没有那么神秘。上世纪30年代,爱荷华大学的文学教授们因为在彼此交流作品时迸发了灵感,便说服校长于1936年开设了第一轮创意写作课,“你读我听”的写作坊就这样流传了下来。到2010年,美国已有220个创意写作的项目,为美国文坛培养了许多优秀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蒂姆·高特罗、理查德·福特等都是MFA(Master of Fine Arts)——创意写作终端学位的获得者。

美国的创意写作方兴未艾,既为读者开启了实现梦想的大门,也为写作爱好者包括媒体从业人员写出更具思想性、可读性的佳作提供了一把钥匙,这种教学方式无疑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借鉴。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纷纷开设与创意写作相关的课程,吸引了许多热爱写作的文学爱好者。7月1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创意写作国际论坛”上,来自中美两国的作家、学者就国际视野内的创意写作和创意写作在中国的发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文学可以教吗

与目前创意写作在国内所面临的质疑类似,在欧美,创意写作教育出现之后,也曾遭遇“作家能否培养”,“创意写作是否削弱了写作者的个性”,“创意写作是否会使文学创作模式化”等诸多争议。不过,随着创意写作实践的广泛开展,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写作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技艺,和其他艺术一样,是可以学习、可以实践的。多萝西娅·布兰德的《成为作家》一书就明

确提出:写作确实存在一种神奇的魔力,而且这种魔力是可以传授的。

阎连科近年来在文学教学领域中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文学是可以教的,无非教的地方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对象不一样而已。他肯定地说:“每一个作家、学者、教育家或者批评家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文学是可以教的,大家不需要采用这么暧昧的态度,这么含糊的表达。”

从事理论研究与非虚构写作多年的梁鸿认为,“灵感”一词传达的其实是中国古典文化中对文学的最大敬意。然而,无论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还是马尔克斯的《礼拜二午睡时刻》,其创作灵感其实都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积累。她说:“我们所谓的灵感可能只是一瞬间的,只是某一种积累,如果我们真的要来写作的话,还是需要严格的训练。”而这种训练,正是文学与写作可以被教授的部分。

文学教什么

既然文学是可以教的,那么,文学应该教什么?创意写作课程着重培养的是学生哪方面的技能?关于这一问题,阎连科援引美国《作家文摘》出版社主席瑞秋·席勒的话,“应该最大限度地学习一切写作方法,然后再决定要用何种方法进行写作”。他认为,创意写作的教学目的在于让我们学习各种方法,提高我们的文学感悟力,从而在写作中选择一种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近年来,王家新围绕诗歌创作开设了“创造性写作课程”,他在教学中逐渐发现,目前创意写作的教育重点应该是对学生的“再教育、再启蒙”,让他们重新获得自己的语言。他通过让学生参与文学翻译的实践,一步步训练他们对文学的敏感、对语言的敏感,提高他们的语言感受和表达能力。

与王家新在高校内所作的创意写作教学探索相似,邵燕君与庄庸计划下学期开设“网络文学写作课程”,要求学生必须在文学网站注册并发表作品,第一

时间进入现场去写作,第一时间获得彼此对作品的直观评价,从而发掘学生内心隐秘的渴望、想象和梦想。

孙郁从沈从文、汪曾祺的师承关系中发现了隐藏在结构、情节等显性层次背后的“暗功夫”,他认为,创意写作课程的教育不应仅仅停留在字词层面,还要引导学生阅读经典文献,阅读作家文字背后的文化和历史,“通过对学生兴趣的引导,看到母语表达下的‘暗功夫’的价值,从而打开母语,从传统表达与当下表达的对立中寻找词语延伸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创造力是不能教的

如果文学写作的技巧和能力确实可以学习和提高,那么,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作家?作为一位从事创意写作教学工作多年的作家,玛丽·海伦认为,创意写作课程的开设并不是为了培养作家,其目的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高度视觉化、快餐化的时候,给大家提供一个机会和平台,让大家还能够被文字感动,能够去欣赏它、领略它,让大家被文字深入人心的力量所感动。

阎连科虽然高度肯定了创意写作课程的意义和可行性,但他依然认为,所谓的“教写作”,其实就是给写作者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写作模式都可以发芽生长的温室环境”,但是发芽之后要长成什么样子,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他还强调,教学可以教会你写作,但不能教你如何创造。创意写作课程会让你的写作能力、人文修养等方面得到提高,但不保证你能成为作家。

与此同时,目前国内外的创意写作课程大多关注的是“写什么”和“怎么写”,却把“为什么写”这个问题搁置在一边。劳马认为,这一问题“关乎写作行为的意义和持续下去的原动力,也关乎写作者内心的某种担当意识的觉醒”。他说:“坚守内心独有的东西,并以此观照社会与人生,才会使写作成为一种精神层面的真正需要和追求,而不仅仅是局限于某种技巧。”他提倡写作者应该“写你想写的,写你能写的,写你认为值得写的,写出自己来”。

《两代文》在京首发

本报讯(记者 王冕) 为纪念王亚平诞辰110周年,7月19日,由野草诗社和老文学艺术家后代联谊会主办的王亚平、王涓父子文集《两代文》首发式在京举行。罗扬、郭传杰、李殿仁、米南阳等部分作家、文学艺术界人士及王亚平的友人故交等参加活动。

王亚平是野草诗社创始人之一,一生曾创作了几十部诗集、剧作集和曲艺集,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文、俄文、罗马尼亚文。其子王涓虽从事科技工作,但因受到父亲熏陶而热爱诗歌创作,并继承了野草诗社的工作。《两代文》一书由作家出版社于近期推出,收录了王亚平、王涓父子的散文随笔、人物访谈、文艺评论等100余篇。首发式暨研讨会上,与会者深情回顾了王亚平以笔为刀投身革命的动人事迹,追忆了与他的交往旧事,赞颂了他历经坎坷、矢志不渝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精神。王涓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新书。

在同日举行的朗诵演唱会上,曹灿、萧振环等表演艺术家和朗诵爱好者朗诵了王亚平、王涓在不同历史时期创作的多首诗作,任士荣、吴国松、吴霜、杨菲等艺术家及老战友合唱艺术团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65年的文学家园

《中国作家》1985年1月创刊,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历任主编为冯牧、陈荒煤、何建明,现任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

创刊之初至1999年,《中国作家》为双月刊。1985年第2期刊发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

2000年1月,《中国作家》改为月刊。2006年1月改为半月刊,即上半月为《中国作家·小说》,下半月为《中国作家·纪实》。2009年1月上半月改为《中国作家·文学》,并在同年出版一期《中国作家》影视文学增刊。2010年7月,《中国作家》改为旬刊,即上旬《中国作家·文学》版、中旬《中国作家·纪实》版、下旬《中国作家·影视》版,每版40万字,每月120万字,是国内大型原创文学旬刊。

本刊首发《建国大业》《辛亥革命》等一批电影、电视连续剧、长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荣获第12届“五个一工程”奖。

《中国作家》设有“《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中国作家》郭沫若散文奖”、“《中国作家》剑门关文学奖”、“《中国作家》中山杯华人华侨文学奖”、“《中国作家》向山群岛新区杯短篇小说奖”。

俞正声主持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全国政协22日在京召开“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专题协商会并讲话。俞正声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意义,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建设,关系到民族精神、国家长治久安和核心竞争力,要精心组织和实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实施,要正确处理文化设施建设和内容建设的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传统传播方式和新媒体关系,高度重视基层文化建设,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改进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管理。俞正声强调,人民政协要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和内容建设。希望政协委员努力创作出更多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精品,努力推动形成有利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良好氛围。

刘奇葆认真听取了委员们的发言。他说,全国政协围绕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内容建设,积极建言出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刘奇葆指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做到保障基本、统一规范、全面覆盖、促进公平,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层次。要抓好统筹协调、健全指标体系,完善基础设施、注重内容供给,进一步加强管理力量,提高群众参与程度,推动边远贫困地区实现跨越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27位政协委员围绕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内容建设,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硬件和软件建设、提升服务质量和效能,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机制作发言,分析了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内容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文化部、国家民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央文明办、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内容建设的情况并与委员互动交流。为开好这次专题协商会,会前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围绕会议议题开展了深入调研。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主持上午的会议。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林文漪、张庆黎、李海峰、陈元、卢展工、周小川、王家瑞、马飏、刘晓峰出席会议。

(吴晶晶)

中国作家协会公报

(2014年第3号)

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办公室收到2014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推荐选题176项。经过专家论证和书记处审核,确定扶持项目90项。其中,民族语文作品21项、小说31项、报告文学9项、散文11项、诗歌11项、剧本1项、理论评论专项6项。

现予公布。

中国作家协会
2014年7月25日

中国作家协会2014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篇目

(见今日2版)

刘醒龙小说《蟠螭》

聚焦楚文化更是聚焦人心

本报讯 7月20日,刘醒龙新作《蟠螭》研讨会在湖北举行。与会专家对刘醒龙的长篇小说《蟠螭》进行了研讨,认为《蟠螭》是一部创新之作、厚重之作。小说在题材和写法上都有较大创新,是刘醒龙文学创作的一次“华丽的转身”、“惊险的一跳”。小说在神秘瑰丽楚文化的渲染、纷繁复杂社会现实的展现等方面带有寓言性质。但变化中有坚守,重点关注的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和人格操守。

与会专家还由《蟠螭》延伸开去,对当代长篇小说写作中的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等话题展开了探讨。器与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小说《蟠螭》在写器物的同时,也在描写人心。曾侯乙尊盘的“器”,在于它眼花缭乱、令人目眩的透空蟠螭纹饰和至今无法复制的内部构造,而它的“道”在于其华丽高贵的气质和种种具有神秘色彩的异象。古老的青铜重器在当下的命运关系到文化安全,而在文化安全的背后,还隐藏着关系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

(湖文)

网络文学「走出去」异军突起不容小觑

□李朝全

日前,在北戴河举行的全国网络文学理论研讨会上,来自晋江文学城的刘旭东介绍说,目前该文学网站每天就有一部作品被签下海外版权。根据晋江文学城提供的最新材料,该网站自2008年与台湾多家出版商建立合作关系以来,完成了《午门囍事》《女皇陛下笑谈婚姻》等多部作品的繁体版出版签约,开辟了繁体字版权输出渠道。2011年,晋江文学城签订了第一份越南版权合同,在繁体版权输出稳步增长之外,还有多部畅销作品如《暧昧》《家有喜事》远销越南,至今已向越南输出200部作品。2012年,《仙侠奇缘之花千骨》签订泰文版权合同,此书也是同类型作品的第一次泰国输出。2013年该书在泰国一经上市便被抢购一空,在2014年泰国书展上,泰文版《花千骨》成为吸引泰国青少年的重要书籍。目前,晋江文学城已同40余家港台出版社、20余家越南出版社、两家泰国出版社、1家日本企业进行合作,海外版权签署量达到了每个工作日1本的速度。这让网络小说一步步走出国门,让很多中国网络作家的文学作品得到众多海外用户的欣赏。版权输出数量与日俱增,不仅带动了海外出版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海外电子版权的输出。

网络文学的海外版权输出,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道新景观。这种由文学网站助力推动的网络文学版权输出,具有及时便捷、全方位、多媒体、交流互动等诸多优势。它可以借助互联网的通讯手段,实现“偏关系的社交型宣传以及私人点对点的表达”,让中国文学作品在第一时间到达海外懂中文的读者手里,并通过网上翻译或版权购买者的翻译出版和传播发行,在最快的时间里到达海外读者手中,几乎实现了与国内作品同时上线、同步上市的效果。这种翻译成果,这种“走出去”的效率是传统纸媒作品所难以匹敌的。因此,我们决不可轻视或者忽视文学网站在助推中国文学作品对外译介方面的巨大优势。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善于利用这些新媒体,从政策、资金、人才等各方面,采取有力的措施,帮助和引导它们将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观的作品推向海外。

一系列文学网站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不必拘泥于纸质图书,网络是一个可资利用的重要媒介;对海外的文化输出,不必局限于欧美等大国强国,也要重视对与我邻近国家、与我国经济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以及在历史、文化、习俗等方面与我相近国家的版权输出。文学“走出去”是一种软实力,软影响,这种“走出去”,必将有助于改善和提升我国在这些国家读者和受众中的形象,从而增进两国的理解和友谊,更好地促进双方全方位的合作。在全媒体和自媒体时代,中外文学文化交流要特别重视网络这一桥梁,要善于利用互联网,将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传播到最广大的受众那里,真正达致切实有效的海外影响,帮助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



《中国作家》(中国作家协会)

